

# 传统社会和文化

## ——以汉代孝亲案件为例的考论

秦双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和文化是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也是法律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孝文化是传统社会和文化最基本的情伦性格。汉代以和为命题,把孝亲作为法律的宗旨,视孝亲为和文化的情感基础,符合以往历史的规律和汉初现实的需要。汉代在和文化的司法适用上,以孝断狱、春秋决狱作为重要司法原则,立孝于民、因孝免罪、严惩不孝的案例被不断援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和文化的智慧是融通情理法,全面整合各种关系从而达到和谐,和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和文化 和谐 春秋决狱 孝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61-04

有汉以来,儒风达道。儒家伦理不仅是修身之本根,亦为国家之定用。先秦儒家和谐之理性,中庸之理想与贵和之宿求,奠定了汉代的政治法律哲学的基础。汉代以孝治天下,孝具有特殊政治法律意义,家庭化的伦理巨化为国家政治的方略。汉王朝开导化之先,使孝成为了法律原则和宗旨,这是情理法文化养成的一个标志,也是传统法和文化底色的彰显与细化。同时春秋决狱、以孝断狱的法律司法纲领,使得国家对孝亲案件的处理具有浓烈的儒性格,具有和文化的价值根基,所以和文化在传统社会发挥着融通情理法重要的作用。和文化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着调节与疏导作用,作为中华法系的基因的和文化的对当今社会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一、孝为法旨——和文化的情感积淀

孝是一种原生态的情感,是中国伦理中最具有意义的,也是传统社会家国结构的基础。孝亲是一种基于血缘而形成的亲情关系与义务,孝是“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sup>[1](P1573)</sup>孝亲是人生而取得自然情感,是原发性的。

### (一)历史积淀——先秦孝亲伦理

汉之前,孝亲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体的伦理架构,奉养尊亲、死则丧祭等孝亲思想已然成为民间的不二法则。国家、社会也将孝亲界定为情感的底色与价值的核心,孝亲是任何人不可逾越的底线。孝亲是诚敬尊亲之责:“善事父母为孝”<sup>[2](P102)</sup>;“用孝养厥父母”<sup>[3](P376)</sup>;“春秋祭祀,以时思之”<sup>[4](P59)</sup>。孝的原生态就是事亲赡养、追忆丧祭,为人论所不免。孝亲是文礼仁善之本:“夫孝,德之本也。”<sup>[5](P34)</sup>“孝,礼之始也。”<sup>[6](P498)</sup>“孝,文之本也。”<sup>[6]</sup>“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sup>[7](P3)</sup>孝亲不仅是一种自然情感和人的本能,更是人类集群社会化的结果,

同时社会化使得孝亲变得更为基础。孝亲是家国一体的根本观念:“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序也。”<sup>[4](P19)</sup>“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sup>[1](P1410)</sup>“夫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sup>[4](P34)</sup>“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sup>[4](P4)</sup>“事君不忠,非孝也。”<sup>[1](P1332)</sup>孝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家庭伦理,而且逐步成为一种国家化的要求。孝是一种衡量上为朝堂君侯、下为兆民百姓的伦理标准。“莫大于孝”<sup>[4](P28)</sup>、“克谐以孝”<sup>[3](P46)</sup>、“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sup>[3](P365)</sup>“申之以孝悌之义。”<sup>[8](P10)</sup>孝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评判标准,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的需要。这些孝亲的要求使得汉代承载着孝亲文化的基因,同时历史积淀的幼穉在汉代温润生发。

### (二)历史需要——汉代孝亲要求

秦的苛法未尽,汉初法制过严,历史需要进行一次调整。基于情理需要,有汉一代,孝治天下是刘氏王朝政治才谋温润生发的表现。“举民孝悌力田”<sup>[9](P90)</sup>可见汉王朝对于孝亲的需要。汉代初期是孝文化理论相对单纯的时期,“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sup>[10](P875)</sup>“孝,善事父母者。”<sup>[11]</sup>孝多是家庭血缘基本要求,“表现为汉代时人们所理解的孝还基本上属于‘父慈子孝’”<sup>[12]</sup>。刘氏王朝尊孝之道、调秦苛法、以满情伦足可显见。这是顺应历史需要的结果。随着时间的变化,现实需要,使得汉代的孝亲文化逐步具有了特殊政治法律意义。孝是逐步成为国家秩序的要求,“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sup>[4](P35)</sup>。孝也是统治者获得政治安全的需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sup>[7](P3)</sup>孝具有统治艺术的意义,同时孝是止恶禁犯的合法性基础,是司法典狱的法学原则。孝也是德教典狱的需要,这为孝成为司法原则提供了基础。“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

\* 作者简介:秦双星(1981-),男,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法律史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的学习和研究。

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sup>[9](P2502)</sup>所以“刑者，德之辅也。”<sup>[13](P73)</sup>汉代的司法原则是明理顺民而万世可立的合理解释。“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sup>[3](P365)</sup>“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sup>[4]</sup>孝亲的不可违与不孝的元恶，构成了以孝论罪的汉代司法中特殊部分。司法者裁断有了维护孝亲、严惩不孝伦理的基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sup>[9](P255)</sup>孝亲在汉代帝王心中已经是特殊的道德，孝是人道的根本，不孝则不道。同时汉代的孝是具有层次逻辑与义务范围的，孝具有“一是谨身节用、敬养父母；二是父母有疾、精心侍奉；三是家庭和睦、累世同居；四是容隐父母之过；五是父母丧，哀伤不已；六是延续家族、继承父志；七是为亲复仇”<sup>[12]</sup>。这为汉代君臣兆民提供了行事标准和价值伦理，也满足了汉代人们情感需要和政治需要。

儒家法律文本的践行与司法裁断的模式，使得在汉代司法中，孝亲的法律原则意义与指导意义得以彰显，汉代的司法逐步被儒化。汉前的历史积淀、汉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使得孝成为法律在运行中必须遵从的原则，同时司法中以孝论罪。汉代人伦需要、统治者的安全需要使得孝亲具有了法律上意义，孝亲伦理延伸到了汉代法律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的道德与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在程度上的伸缩。”<sup>[14](P24)</sup>所以孝成为汉代刑事司法的法律原则与宗旨。固有的孝亲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汉代需要发挥了合力作用，司法案件的处理需要兼顾到孝亲伦理，或者说和文化机理使得情理法模式成为了一种司法导向。

## 二、遗案解读——和文化的司法实践

秦代苛法亡国的余温尚在，汉代国舵手以孝布道。以孝布道不仅是汉代法制的道德化，而且是一种情理的高调回归。“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sup>[7](P171)</sup>经过先秦的文化积淀、秦代苛刑悖论验证，历史将儒家和文化之幼穉，植根在刘氏王朝的沃土之上。董仲舒应时而举，以“春秋决狱”为国谋，开汉代和文化典狱之先河。董仲舒提倡“《春秋》之道”<sup>[13](P10)</sup>，视其为天道人伦之法。大儒董仲舒将儒家的思想立为万世大法，其认为“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sup>[13](P12)</sup>。董仲舒认定汉代是暴秦的拨乱者，需要损益夏周文法以定汉制。《春秋》为汉法之根本，孝亲是《春秋》核心价值，所以以孝论罪合乎儒家伦理和汉代“春秋决狱”原则。以孝论罪为汉代和文化的适用提供了理论保证。“春秋决狱”、以孝论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理论的设想，也有实际司法判例基础，这便于司法官员进行援引裁断。目前现存汉代案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三个案件加以论述。

### (一)仇览导人尊亲案——立孝于民

案件：“(仇)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耻。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节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

成孝子。”<sup>[10](P1676)</sup>

在本案中，陈元之母，向仇览告发其子不孝。当时如果援引前法，陈元必因不孝而获罪，因为“这是秦朝延续下来的审判风格——客观归罪”<sup>[15](P132)</sup>。但是仇览认为陈元不应被苛以极刑重罪，实际上陈元之罪应当是教化未至的因素，需要进行教民孝亲。正如不教而杀不可取一般，民间未感教化是难以树立孝道观念的，所以需要树立孝道之风气，而不是一味刑杀。这是对《春秋》之道、孝亲理念的一种变通，“《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sup>[13](P16)</sup>。贯以前案，如果这是一味恪守表面的春秋大义，确实达不到真正的大义。司法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理疏解与变通，否则春秋之义可能会导致家庭之难。本案中仇览认为确定不孝罪，需要根据陈元的真实心意加以确认，不是只看表面，还需要司法者“原心”论罪考察行为动机。同时“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sup>[16](P397)</sup>这里的心，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生发之动机性，所以本案的儿子不可妄论不孝。“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sup>[17]</sup>汉代司法者以此案为判例，树立一种对于具体情节的重视，同时也要在变通中树立一种对于大义的遵守。不以刑杀为教，重视培养民间孝亲意识，有利情理法的和谐。

### (二)刘爽告父弃市案——严惩不孝

案件：“元朔五年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不朝。乃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赢之长安上书，言衡山王与子谋逆，言孝作兵车，锻矢，与王御者奸。至长安未及上书，即吏捕赢，以淮南事系。……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孝坐与王御婢奸，乃后徐来坐，盎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sup>[9](P2156)</sup>

在这个案件中，刘爽将其父亲告发，最后为国法不容，除去叛逆之罪原因外，就是违反了孝亲大义，这是亲亲守匿原则得以确立和适用于司法的结果。《春秋》提倡父子可以互相隐藏罪证，告发父母者要被处以重刑。基于父子伦理关系，太子爽不能告发父亲还要隐瞒其父之罪。汉代法律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儒家提倡的亲亲得相守匿原则的彰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sup>[7](P177)</sup>，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情伦、亲缘关系在汉代是一种重要的司法要素。司法者在处理有关伦理的案件中，需要尊重和遵循《春秋》大义，要对没有守匿者苛以重罚。君主也是在立法方面将其为国家之律法，汉宣帝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妻匿大父母，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sup>[9](P251)</sup>应当说，汉代统治者在处理这样亲属间隐瞒犯罪方面，不仅是考虑了行为人的动机和实际目的，而且也是做了一番家国政治的考量。苛严的秦律不仅是亡国之鉴，更是对于家庭亲情的破坏。家国固有的构成关系与人情不可违背的天性，是亲亲相守匿得以生发之源泉。刘氏统治者也将亲亲守匿作为孝道基本原则，是一种在司法方面缓和法律苛严的过渡，也是对于情理法和谐文化的历史顺从。

### (三)赵娥复仇宽赦案——因孝免罪

案件：“酒泉庞道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sup>[10]P1889</sup>

在本案中，赵娥之父为恶霸李寿所害，自是弱女远嫁，其兄又病故。然赵娥志于复仇，日夜不寐，“常帟车以候”<sup>[10]P1889</sup>，终于手刃仇人。在赵娥复仇案审理中，司法者深感赵娥孝义，要与赵娥共生死。刺史和太守“并共表上，称其义烈，刊石之碑，显其门闾，帛二十端礼之”<sup>[10]P1889</sup>，为赵娥请愿免罪。“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sup>[10]P1889</sup>赵娥认为手刃仇人有违国法，自知杀人偿命的道理，所以自首、不肯去。在司法官员赞誉和请愿中，皇帝发布赦诏，赵娥免罪受赏。依据杀人偿命的前法，赵娥本应被处以死罪，但是孝亲的大义，不仅使司法者深受感动，而且司法者积极运用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为赵娥开罪。“《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sup>[13]P23</sup>虽然赵娥为父报仇有违律法，但是本事原志确实为伦常之义，所以免罪。此后在复仇案件司法审判中，法律对于犯罪者的动机有着明确的要求，不将单纯的结果作为司法中的唯一考察点，而要“《春秋》缘人情”<sup>[13]P35</sup>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春秋决狱”、以孝论罪将复仇的案件审理引向了儒家方向，建立一种因孝免罪司法文化。“《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sup>[13]P9</sup>复仇案件具有判例性质，司法者具有司法上援引。“宥过无大，刑故无小。”<sup>[3]P91</sup>法律需要宽赦复仇者之罪。以孝断狱对于犯罪者的动机有着明确的要求，不可以单纯的结果作为司法中的唯一考察点，而是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这种审判思想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同时这也是对于情理法和谐的保障。

“汉时去古未远，论事者多传以经义。”<sup>[18]P163</sup>汉代司法文化较之秦代出现了一次变革，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以孝论罪原则具有划时代意义。“故其治狱，时有出于律之外者。古义纷纭，迥异俗吏，固不独仲舒如是也。”<sup>[15]P134</sup>虽然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原则不是其历史的独创或者原创，但是汉代司法儒化是在秦暴后一次司法原则的调整。“《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sup>[13]P9</sup>“春秋决狱”强调不仅考虑动机，也充分考虑事实。实际上春秋经义的微言大义用来指导法无明文的疑难案件，经义决断具有立法与司法的双重功能。同时“春秋决狱”获得统治者的认可，符合汉代需要和历史要求。

### 三、通情理法——以和断狱的解读

孝亲是和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其维系着上至国家、下至家庭的体系，所以传统社会是讲求孝亲的社会。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儒家孝伦理为内核的原则贯穿始终。传统法重视孝亲、立孝为法旨、以孝断狱实际上是和文化的外延。儒家讲求和谐、贵和求稳、通情理法的宗义决定了传统社会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实践的样式，所以传统法文化主要

是建立在儒家和文化的基础上，在司法领域讲求以和断狱。在深层意义上，以和断狱是情理法要求，需要兼顾情感、法理、国家政治因素，其目标是追求情理法的和谐顺通。

#### （一）情感根基——血缘亲情的需要

孝亲是强烈的血缘伦理，是家人意识的表现。孝是古代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与基础的价值。儒家倡导的家庭关系的“亲亲”，是孝亲的情感需要。儒家以和断狱的情感根基是建立在孝亲意识的基础上的。孝亲伦理主要体现在尽孝方面，孝亲生于天性，产于伦常，立为人道，是情感寄托和为人义务。同时“圣人治天下有道……要在孝悌而已。”<sup>[19]</sup>孝亲表现为家族伦理的遵从和对天下有治的维护，是人们有着固有感情的需要。“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sup>[9]P2515</sup>孝亲是和文化的根基，尽孝成为情理法和谐中关键因素。“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以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先王……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sup>[4]P23</sup>“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sup>[20]</sup>这是在汉代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情感根基，是对以孝达至和谐的总结，也为后世的孝亲意识奠定情伦上和法律上条件。血缘亲情的原始驱动，使得尽孝得福，不孝获罪。以儒家的《孝经》、《春秋》等为代表的微言大义，不仅使得汉代司法具有一种体察情理的情节观察，同时也成为一种具有直指人心的实体正义哲学。以和断狱基础不仅是服务于司法公正，更是符合儒家的血缘亲情观念。

#### （二）法理根基——贵和观念的引导

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法理根基是贵和观念。在法律思想方面，情理与法理进行着调整，视和谐为最高原则，贵和观念成为根本指导思想。传统社会贵和是恒久的命题，贵和是法律目标和价值所在。儒家确定的道德伦理为解决矛盾原则，很大程度上贵和起着法律原则的作用，在解决这些矛盾时考虑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结合。“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能察之，无物不在。”<sup>[13]</sup>道往而明来之学，正是法律遵从的贵和观念。在传统社会司法文化有着贵和观念的引导，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等儒家教育树立了传统的道德与法律的和谐关系。同时国家的法律理论具有诸多的贵和特点，只要是符合和谐的要求，就可作为化解争端的方法。家庭化的孝伦理具有保持社会的稳定性，这就为以和司法提供了条件。“《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sup>[9]P2523</sup>明法度需要古今通谊，尊天地常经《春秋》，以和为贵。同时孝等道德伦理发挥着作用，法治运行需要兼顾情理道德的因素。“和”是法律的原生态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礼乐刑政”和谐存在的一种必然选择。法理上贵和观念引导情理与法融合，同时国家解决社会争端需要兼顾情理的因素。法理上贵和观念因此具有历史传承性，成为传统社会的司法原则。在传统社会以和为贵的法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贵和观念的引导是追求情理法的和谐顺通的不争证明。



### (三)政治根基——秩序安全的追求

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政治根基,是围绕着国家秩序和统治安全展开的,这是具有天理意义的。传统社会如何实现秩序安全是法律的责任和追求所在。秩序安全不仅需要通过法律的调整,而且需要在维护和保持大局的稳定中,寻求情理的疏导。不孝则不和,不和则国不稳,所以需要重视孝亲,保持和谐。汉代以和断狱是具有明确指向的,目标是达至国家安定。“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sup>[9]</sup>(P2520)董仲舒使得“儒家的经义等同于甚至高于现行法律价值”<sup>[15]</sup>(P134)。其目的就是要缔造一个稳定的汉帝国。从传统法角度出发,“和”的司法文化是一种理性选择,符合汉代历史阶段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汉代通过调整情理法达成和谐是明智之举,其中国家秩序稳定是其理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需要综合衡量取舍的过程,往往反映着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是反映民族性格的一个过程。同时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秩序安全为基础,这是固有和文化的出发点。所以对待实际问题就需要从实现秩序安全的角度出发,兼顾各种要求,力求求得秩序安全。因此以秩序稳定为基础的经权之术有着诸多的灵活性,对于秩序的保障不是完全依靠单一手段实现,只要是秩序安全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就可作为解决矛盾的方式。秩序安全作为最终目标,是和文化的政治基础。

汉代以和断狱符合情感、法理和国家政治要求,所以和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通情理法的一种模式,不仅是兼顾了家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国观念的兼顾。和文化中对于孝亲的案件的认知,以及在和文化基础上的司法裁断,都是一种通情理法的综合治理的模式。和文化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和脉络,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和断狱不是一种突然间的产物,而是一种被历史掩盖后发迹的法律文化。所以以和断狱不仅是法律儒家化,根本上是中华法系自我发展延续的需要。

#### 余论

传统社会是儒化之社会,儒家思想文化也是情理法内化核心。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儒家文化起着关键作用。汉代以儒为尊,孝治天下,孝具有特殊的政治法律意义,家庭化的孝伦理渐渐巨化为国家政治的方略。“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sup>[10]</sup>所以在实际的司法中,汉代司法者运用春秋决狱原则维护孝亲,开儒家和文化典狱之风。在司法裁断中,因教民孝义、孝而免罪、严惩不孝的案件成为了模板和经典案例。这是汉代情理法文化养成的一个标志,也是

以和断狱的彰显与细化。以和断狱的目标是平衡天理、国法、人情的需要,达到各方相对安稳的状态。在传统社会,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消解说明了传统法固有的生命力,这样的生命力是在情理法和谐的导化下衍生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和文化机理的历史维度,所以和文化是传统法的魂灵,也是传统文化的基因。

对传统法文化基因中优秀部分的继承与发展,应当被视为当今社会的文化义务与意识责任。和文化的基因也需要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显示其强大价值。我们需要在不盲目谀古的过程中,探索与求证新的和谐价值与中道路径。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同时,更要重视法律与社会价值的真实实现。我们在遵循现代法治理念的同时,对于情理的需要给予适当的兼顾,保持情理法的中国特色。同时当代法律建设需要回采历史的精要,进行优化择选,所以法治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更需要达至实体正义,使得情感有所慰藉,国家得以安宁。所以法制建设需要我们吸纳儒家中庸、和谐文化的精神,结合当代法理的基本精神,链接历史与现实,全面和谐情理法。同时从传统法的可取性价值出发,寻求法律在和谐社会应有的角色,这对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郑元.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郭璞.邢昺.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孔颖达.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邢昺.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国语(卷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
- [7]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黄宗炎.周易象辞(卷一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
- [12]侯欣一.孝与汉代法制[J].法学研究,1998(4).
- [13]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6.
- [15]武树臣.儒家法律传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 [16]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7]桓宽.盐铁论(卷一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
- [18]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9]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九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
- [20]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